

又闻端午菖蒲香

□ 杨治钊

“菖蒲，乃蒲类之昌盛者，故曰菖蒲。”这是李时珍《本草纲目》中对菖蒲的解释。有史料记载，从唐宋时代开始，祖先们就流行在池塘、水田等地种植菖蒲。菖蒲叶片是绿色的，狭长的，又直又尖的，呈剑状线形的。正如《本草图经》所描述的：“其叶中心有脊，状如剑。”因此也称“蒲剑”。

农历五月，瘴气生发，蛇蝎蜈蚣，日趋活跃。有人称之为“恶月”，而端午节则称为“毒日”。民间把艾草菖蒲扎成一束，倒悬挂于门上，那些邪虫恶毒、妖魔鬼怪，看见菖蒲其形如利剑，锋刃向下垂着，不敢随便轻入。菖蒲就成了家家户户门上的“守护神”。唐朝诗人李白更是将菖蒲药效夸大，他在《嵩山采菖蒲者》写道：“我来采菖蒲，服食可延年。”比较科学的解释是，菖蒲含有芳香油，挥发弥漫在空气中，可以杀灭有害病菌。

菖蒲并不是什么稀罕物，正如《诗经》所记：“彼泽之陂，有蒲与荷。”冬天刚过，其他花草还在懵懂时，菖蒲就已经开始醒来。它从水底探出头后，至五月初五之时，已是郁郁葱葱，犹如翡翠雕琢的绿宝石，闪烁着绿色的光泽。

菖蒲于寒冬尽头，先于百草醒来。生命力极其旺盛，耐苦寒，安淡泊。看起来，线条流畅，天然绿意，身姿挺拔。于是，有人将菖蒲与兰花、水仙、菊花并称为“花草四雅”。近人张听薰《论菖蒲十则》云：菖蒲有山林气，无富贵气；有洁净形，无肮脏形。清气出风尘以外，灵机在水石之间，此为静品。“这样正是契合文人清高之风骨。因此，自古以来，菖蒲是文人墨客赞美的对象，也是丹青妙手作画的素材。苏东坡说菖蒲：“忍寒苦，安淡泊，与清泉白石为伍，不待泥土而生。”郑板桥题画诗云：“玉碗金盆徒自贵，只栽蒲草不栽兰。”陆游借菖蒲抒发心情：“寒泉自换菖蒲水，活火闲煎橄榄茶。自是闲人足闲趣，本无心学野僧家。”字里行间，透出他对菖蒲的欣赏之意。



旧时三个苦行当

□ 赵理章

小时候常听老一辈们讲，世上三百六十行中最苦最累的有三个行当(行业)：打铁、牵船、做豆腐。

打铁：旧时的打铁匠(俗称打铁佬)。打铁时没有一点机动的外力可替代，不论锻打的是铁器大件，还是小件，铁器锻打成形全靠的是体力臂力。在铁铺锻打的工场间，一个铁墩子的对合面一人双手抡一个几十公斤重的大铁锤，另一面一人一只手抡一个几公斤重的小铁锤，一只手抓铁钳，挟着烧红的铁块在铁墩子上不断地翻转锤打，两人配合默契轮流地各打一锤。铁块进炉、出炉、锻打反反复复不知多少回合，才可把一个铁器的毛坯锻打成形。打铁匠不论是春夏秋冬，不论是严寒酷暑，身旁一个高温的炉子，炉膛里几百度的高温，时时刻刻在烘烤着他们的肉体。上世纪五六十年代，我们村里有一个打铁铺，是盐城籍姓施的父子三人所开。打铁铺里，低湿的冬天他们穿着很单薄的衣服，挂一个皮围子，在锻打作业时也是汗流满面。还有累的是他们要把打制好的铁器成品，担挑肩扛送到四乡八里的村头田间，特别是农忙季节，刮风下雨也要送到农民手上，所以过去农村的铁匠更为辛苦。

牵船：旧时的牵船工(船夫)。这一行当是三个苦行当中最辛苦的一行。船运的货物不论路途多远，不论刮风下雨，寒冷的冬天除外，在大半年的时间里船工们都是赤着脚，沿着崎岖不平蜿蜒曲折的河道，负重前行。四十厘米长、十厘米宽的木制硬质牵绳板，斜倚着紧紧地压在船工的肩胸之间。遇上风逆流时，他们头向而使使劲地牵拉着船，喘着粗气，每迈出一小步都十分艰难。用力牵拉时身体倾斜，甚至要和地面形成四十度左右的夹角。牵船人员有两人组，有三人组，有时还需五人组，途中每遇到紧临河边的树林、村庄、城镇、桥梁时，是他们最辛苦最麻烦的时候，只能摇橹和用竹篙撑行越过障碍。船工日复一日、月复一月、年复一年，在船上、在岸上、在风雨里负重前行，以船为家、以水为伴。

做豆腐：旧时做豆制品开豆腐坊这一行当确实也是很辛苦的，最主要的是从业者常年睡的是半夜觉。豆制品的制作是一项费时费力的辛苦活。先磨豆浆，磨豆浆的石磨有单人推的、双人推的。磨豆浆要人工推磨，不知围着石磨要转多少圈。豆浆磨好以后搓浆(豆浆中的豆渣过滤掉)，搓浆时人的身体手臂肩膀要三联动，如是初次搓浆手臂肩膀要酸痛几天。豆浆沥好烧沸，用盐卤点浆或冲浆(俗称点花冲花)，一刻钟左右豆浆成豆腐花(豆腐脑)，再上箱压豆腐块、豆腐干、百叶等，这一套全下来，又苦又累，要耗时好几个小时。从前我们农村的豆腐坊，每天把做好的豆腐装进水桶，早早地担挑沿村挨家挨户叫卖，卖豆腐也不是个轻松活。

自从改革开放以来，经过近半个世纪的发展，各行各业取得了巨大的进步。依靠工人牵船的水上运输，早已被大型的机动船替代；打铁这一老行当，都已用上电力自动锻打，很多产品生产过程中，用上了高档的智能设备自动控制；现在农村做豆腐，磨豆浆也早已用上了电动磨浆机。从前这三个行当的苦，随着几十年来的社会发展变化，已经成为历史的记忆。



仲夏佳节话“端午”

□ 乔长富



清代镇江龙舟节

见西晋时期已流行端午那天吃粽子悼念屈原的风习。又据《太平广记》第二百九十一卷所录《续齐谐记》“屈原”记载：“屈原以五月五日投汨罗水，而楚人哀之。至此日，以竹筒贮米，投水以祭之。汉建武中，长沙区曲，白曰忽见一士人，自云‘三闾大夫’，谓曲曰：‘闻君当见祭，甚善。但常年所遗，恒为蛟龙所窃。今若有惠，可以楝叶塞其上，以彩丝缠之。此二物蛟龙所惮也。’曲依其言，今世人五月初五作粽，并带楝叶及五色丝，皆汨罗之遗风。”今天看来，吴均所记还只能说是传说，但这一记载所说“汉建武中”显示早在东汉光武帝建武年间(公元22—25)可能已出现五月初五吃粽子以悼念屈原的风习，这一风习开始可能是始于楚地。再从《唐会要》卷二十九所录唐高宗在龙朔元年(661年)五月五日，询问侍臣说“五月五日，元为何事”看，唐代初期可能中原地

区还不流行五月初五过端午的习俗，否则唐高宗不会提出这个问题。

镇江古代在五月初五的活动，最早是见于《隋书·地理志》的记载：“京口人并习战，号为天下精兵。俗以五月五日为斗力之战，各以强弱相敌，事类讲武。”从这一记载看，很有可能至少在南朝后期，京口地区已有五月初五过端午的习俗。之所以会如此，当与京口处于“吴头楚尾”，“吴粤与楚接比，数相并兼，故民俗略同”(《至顺镇江志》卷三“风俗”)有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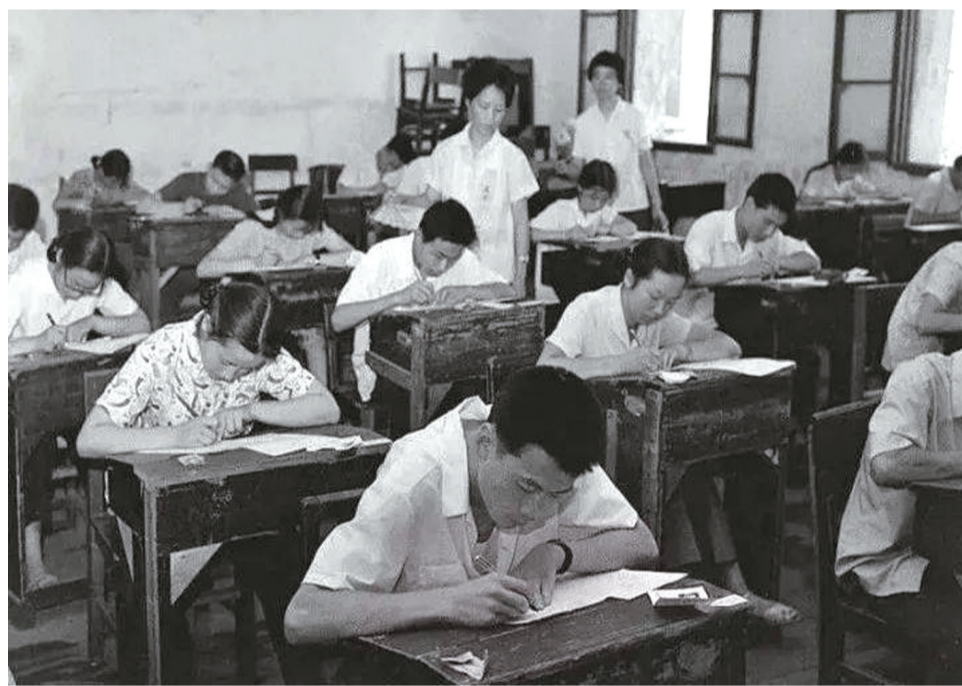
唐宋以来，五月初五过端午的风习已流行全国。对于当时流行的情况，《至顺镇江志》“端午”所录文献就显示唐代后期至宋代，就流行“竞渡”“斗力”“系百索”“为角黍”“饮蒲酒”“斗百草”“戴彩头符”“画天师像”等风习，当时润州也当会流行有关风习。到了清代，《光绪丹徒县志》卷四“风俗”载：“五月五日悬钟馗像，奉以角黍、蒲艾、榴花。女

插鬓，儿悬襟。午焚苍术，香蒲作剑。又为人悬于门上。室中挂帖五毒符。修制诸药，以雄黄浸酒，绕室喷之，云‘避毒虫’。女人以蒲艾各草浸水一盂，午刻向门外泼之，谓之送瘟。以线编作虎形，饰以彩画，亲戚相馈遗。自午至暮，市闭不开。”今天看来，以上所记端午风习中，虽有一定程度的迷信色彩，但也有一定程度的防治疾病，强身健体的意义。特别是“竞渡”这一风习，明代镇江就已流行。今天已发展成为一种体育竞赛项目。明代张岱《陶庵梦忆》载：“瓜州龙船，一二十只，刻画龙头尾……自五月初一至十五日，日画地而出。五日出金山，镇江亦出，惊涛跳沫，群龙格斗。偶堕涸洲，则蚶捷撑，蟠委出之。金山上人簇，隔江望之，蚊附蜂屯，蠢蠢欲动。晚则万艘齐开，两岸皆香然而沸。”清代陈维崧有《贺新郎》“金山观竞渡”咏写其事。由此可见，明清时期，龙舟竞渡曾是镇江庆祝端午的一项重要活动。

端午习俗流行于世以后，有关的神话传说也逐渐流行于世。其中，白蛇传说就是相关传说中最具代表性的传说之一，而且这一传说又是与古代镇江有着重要联系。明代张岱《陶庵梦忆》载：“瓜州龙船，一二十只，刻画龙头尾……自五月初一至十五日，日画地而出。五日出金山，镇江亦出，惊涛跳沫，群龙格斗。偶堕涸洲，则蚶捷撑，蟠委出之。金山上人簇，隔江望之，蚊附蜂屯，蠢蠢欲动。晚则万艘齐开，两岸皆香然而沸。”清代陈维崧有《贺新郎》“金山观竞渡”咏写其事。由此可见，明清时期，龙舟竞渡曾是镇江庆祝端午的一项重要活动。

1978，我的高考记忆

□ 王建一



1978年是我国改革开放的起步之年，也是我难以忘怀的一年。那一年是“文革”后恢复高考的第二年，也是高考实行全国统一命题考试的第一年。我作为已有8年工龄的青年工人参加了那年的高考。到如今虽然46年过去了，但回想起来，当年参加高考前后的情形还是记忆犹新。

1971年，上了两年初中后，我被分配到和平路上的镇江标准件(车辆)厂里当学徒工。经过3年学徒、数载钻研，逐渐成为一个熟练的机械工人。1978年，四月的一天，厂里突然通知，上午停产两个小时召开全厂职工大会，说是传达上级关于高考的最新文件精神。我们当时感到厂里很重视这个会，因为厂里召开职工大会，从来都是下午下班后才开，很少因要开全厂职工大会而占用上班时间。果然，会上厂领导传达了国家关于1978年高考实行全国统一考试的精神(1977年未实行全国统一考试，是各省自己出卷子)，讲了重要意义、报名条件、录取方法、考试时间和科目等，并鼓励我们青工积极报考。而最让我们向往的有两条：一是国家规定，凡是参加工作工龄已满5年的，考上大学后可以带工资上学，而且工龄照算；二是厂里为鼓励大家报名参加高考，在考前可放考试复

习假15天。于是包括我在内十多位青工都报了名。

1978年的高考也分文理两科，理科要考政治、语文、数学、物理和化学等5门。因为我们初中两年根本没上过物理、化学等课，只上过“工业基础知识”“农业基础知识”课，所以只能选考文科。文科考政治、语文、数学、历史、地理等5门。市教育部门为了帮助考生复习好功课，还举办了各个课程的高考辅导讲座(全部免费)，请我市高中教学名师上大课，我们利用厂休听过几次课。记得有一次数学辅导讲座是在河滨公园附近义路上的镇江建筑公司礼堂，来了好几百人，既有各行各业的青工，也有上山下乡的知青，既有1977年、1978年的高中毕业生，也有很多待业青年，年龄看上去从十七八岁到三十多岁都有。人虽多但全场课堂纪律非常好，除了老师的讲课声外没有其他任何杂音，一双双渴求知识的眼睛至今还令我难忘。严格来讲，当年我们初中毕业时的实际文化程度只能达到小学五六年的水平。因为十年动乱期间，就没有正常上过多少时间的课。

对知识的渴望、进大学深造的愿望在激励着我们抓紧时间复习迎考，尽自己能力争取考好。那年高考前一段时间天气非常热，晚上家里实在闷热，于是就搬个凳子到家门口的的人行道上就着路灯边纳凉边看书复习。高考前的五六月份正是厂里上半年生产任务最紧张的时候，我们一边“大干快上”保质保量做好本职工作，一边抽空在装配台边、机床旁、钳工桌前“研究”数学题(因为数学是我们的弱项)。

那些年的“书荒”使得我们手头别说复习辅导书，就连高中的课本也没有一本。好在为了帮助广大考生复习迎考，国家出版发行了一册《1978年高考考试大纲》，详细列出了各科考试知识点，为我们复习指明了方向。但复习资料奇缺仍是个大难题。就拿语文来说，幸亏自己平时喜欢买书看书，从而弥补了缺少语文复习资料的不足。那时候大市口新华书店里也没有多少书供读者选择，我会利用比较难得的出差的机会逛逛大城市的新华书店。历年买到的《现代汉语语法知识》《现代汉语修辞知识》《现代汉语词汇知识》就给我提升语文水平派上了用场。地理科目，在没有课本和复习资料的情况下，之前买到的图文并茂的两本地图册《中国地图册》《世界地图册》便救了急，成了我复习地理的重要“法宝”。

高考是在7月20日至22日，至今我还保存着当年的《高等学校统一招生准考证》，正面是考生信息，反面是6条“考生须知”和日程安排。考前的一天午后我到市口百二店三楼买了新的文具。考前还通知我们考生熟悉了设在镇江四中的考场，考场在一排平房教室里。当年高考社会关注度不高。没有交通管制，没有家长送考，没有禁噪，甚至我父母都不太清楚我参加了高考。天气太热，考场里放了几块大冰块降温，还放了一洗脸盆自来水和毛巾给我们考生解暑用。高考结束后没多久成绩单就发给我们了，我文科5门总分是319分(满分是500分)，记得有4门及格了(每门满分为100分)：政治79.5分、语文77分(后来听说77分在语文学科里是不错的成绩了)、数学21分(虽然数学分数最低，但自己却很满意，因为当年考卷中初中部分的试题我基本上都做对了，毕竟我们没上过高中，初中两年也没正经上过多少课)、历史73分、地理68.5分。原以为会落榜了，毕竟从得

知我们可以参加1978年高考到进考场，才3个多月，复习时间确实太紧了一点。

到了8月份，因为厂里一台机床在上海机床厂修理，我和师儿等几人遵照厂领导的指示去上海“见识世面、学习技术”。那时上海机床厂是全国机床生产厂家的“顶流”。那几天，我们住在沪上一个名叫“新疆旅社”的小旅馆。从旅馆乘公交车到上海机床厂，途中要经过复旦大学，一连好几分钟，车窗外都是复旦大学的围墙，那时才知道大学有多大。一天晚上，我们转乘好几路公交车刚回到旅馆，服务员阿姨就告诉我镇江有长途电话来，要我第二天上午8时到镇江康复医院参加高考体检(当年是分数线出来后再组织体检)。后来知道，体检分数线是300分。于是立马跟同事请好假，赶往火车站。

坐了一夜的火车(慢车)，中途停靠了无数的小站，第二天清晨才到镇江，回家稍微歇歇，洗漱一下，赶到康复医院体检。人很多但很有秩序。

体检后还要“政审”。我的“政审”结果是在20年之后一个很偶然的情况下知道的。当年的考生材料全部都收藏在自己的干部(职工)“个人档案材料”袋里，包括5门考试科目经批阅打分的考卷。在“考生登记表”的“政审结论”一栏里，赫然盖着一个长方形的蓝色印章“可入绝密专业”。可惜自己考分不给力，与“绝密专业”无缘了。

多年后才知，1978年全国参加高考人数610万人，录取人数40.2万人，录取率7%。

到了当年9月份，录取通知陆续到了，在镇江火柴厂上班的我弟(下放回城知青)也被录取在“南京医学院镇江分院”(即后来的镇江医学院)。但我体检后一直没有消息。我们在厂里也很忙，生产任务也很重，高考的事就淡忘了。到了当年初冬季节，正在车间里忙活的我被通知到厂政工科取信件，谁知接到一纸录取通知书，是我被扩招并录取到“南京师范学院镇江分院镇江大专班”读书，于是就告别了工友师傅们上学去了。

厂里落实“带薪上学”政策，上学期间每个月的30多元工资一分不少，月由一位李姓工友带给我，一直发到我毕业月分配到镇江市第十三中学当老师那个月，连厂里组织职工包场看电影也忘了我。

知我们可以参加1978年高考到进考场，才3个多月，复习时间确实太紧了一点。

到了8月份，因为厂里一台机床在上海机床厂修理，我和师儿等几人遵照厂领导的指示去上海“见识世面、学习技术”。那时上海机床厂是全国机床生产厂家的“顶流”。那几天，我们住在沪上一个名叫“新疆旅社”的小旅馆。从旅馆乘公交车到上海机床厂，途中要经过复旦大学，一连好几分钟，车窗外都是复旦大学的围墙，那时才知道大学有多大。一天晚上，我们转乘好几路公交车刚回到旅馆，服务员阿姨就告诉我镇江有长途电话来，要我第二天上午8时到镇江康复医院参加高考体检(当年是分数线出来后再组织体检)。后来知道，体检分数线是300分。于是立马跟同事请好假，赶往火车站。

坐了一夜的火车(慢车)，中途停靠了无数的小站，第二天清晨才到镇江，回家稍微歇歇，洗漱一下，赶到康复医院体检。人很多但很有秩序。

体检后还要“政审”。我的“政审”结果是在20年之后一个很偶然的情况下知道的。当年的考生材料全部都收藏在自己的干部(职工)“个人档案材料”袋里，包括5门考试科目经批阅打分的考卷。在“考生登记表”的“政审结论”一栏里，赫然盖着一个长方形的蓝色印章“可入绝密专业”。可惜自己考分不给力，与“绝密专业”无缘了。

多年后才知，1978年全国参加高考人数610万人，录取人数40.2万人，录取率7%。

到了当年9月份，录取通知陆续到了，在镇江火柴厂上班的我弟(下放回城知青)也被录取在“南京医学院镇江分院”(即后来的镇江医学院)。但我体检后一直没有消息。我们在厂里也很忙，生产任务也很重，高考的事就淡忘了。到了当年初冬季节，正在车间里忙活的我被通知到厂政工科取信件，谁知接到一纸录取通知书，是我被扩招并录取到“南京师范学院镇江分院镇江大专班”读书，于是就告别了工友师傅们上学去了。

厂里落实“带薪上学”政策，上学期间每个月的30多元工资一分不少，月由一位李姓工友带给我，一直发到我毕业月分配到镇江市第十三中学当老师那个月，连厂里组织职工包场看电影也忘了我。

